

# 口述史视野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以山西省保德县口述资料为中心

王俊斌

(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天津 300222)

**摘要:**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对当代农村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对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发展进行概述,且使用资料较为单一。而以山西省保德县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对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农民进行口述访谈,不但可以了解国家政策在基层农村的具体运作,而且对被这场运动裹挟其中的广大农民的真实心态也有了清晰的认知。以底层农民的视角再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场景,深化了对这场运动的学术研究。

**关键词:** 农民; 农业合作化; 口述资料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4)05-0113-05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当代农村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学术界对此研究颇多,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采取宏大叙事的研究方法,注重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发展情况以及领导人的决策过程,甚少涉及基层农村的具体运作和广大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心态。本文选取晋西北地区保德县为个案研究对象,以大量口述访谈资料为主<sup>①</sup>,辅之以地方志和档案材料,从亲身经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视角,再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场景。

##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前的贫富差距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广大农村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自身所具有的发展个体小农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一些农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两极

分化现象。据山西省农业厅和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在1950年8月的《晋东南武乡县农村考察报告》：“土地已开始变动,农村阶级关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二倍以致三倍。……我们认为,农村两极分化的趋势是明显的,发展是很快的。”<sup>[1]637</sup>这成为长治地委在全国率先试办初级农业社很重要的理由。那么,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农村的贫富分化程度有多大?卖土地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来看农民的回答:

1. 问:合作化以前是不是已经有卖地的?

答:有了。

问:卖地的多吗?

答:很少。那时候分土地后就二绵(人名)家妈妈那时还没入了社,卖给二子(人名)家爸爸好几垧地,结果一买下就入社了,他也带了害了。他估计过几年或许农业社不立,况且地也

收稿日期:2014-03-18

基金项目: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资助(2011SZK14)

作者简介:王俊斌(1977—),男,山西保德人,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① 口述访谈时间为2008年2—5月份,访谈对象包括了上世纪50年代保德县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区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社社长、农业社会计、农业社社员等30余人。口述资料已由笔者整理为《保德县土改、合作化口述访谈资料》(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不贵,我买下也没有害处。

问:二绵家妈妈为什么卖地?

答:他家要走口外(走西口,移民到内蒙古)卖了就走了。再也没有听见卖地的。<sup>①</sup>

2.问:合作化以前村里贫富差距大吗?

答:有点差距,但不大。土改后地主、富农没有了,抗战时期就整的差不多了,减租减息、四大动员。人们(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勤劳点的人稍过得好些。

问:村里当时卖地的人占的比例大吗?

答:不大,勤快的收入好些,懒惰的就收入差些。(人名)就连锄地都懒的锄,所以他就不够吃。

问:当时有卖地的但也不多,人们的贫富差距不大?

答:不多。差距大就是差在懒惰和勤劳上了。<sup>②</sup>

3.问:村里在土改后合作化以前有卖地的吗?

答:也有。

问:多不多?

答:不多。

问:有些什么人卖地?

答:我想想。狗命(人名)家卖了。

问:他家为什么卖?

答:他就拣赖地卖。自己不想种赖地。人家日子过的不错。

问:他是嫌地不好才卖的?

答:对,是嫌不好。

问:还有谁家卖了?

答:再就是林孩(人名)家也卖地。

问:他为什么卖。

答:因为太穷,林孩平时不干正事,是个浪荡鬼。就把房地都卖了。都是我家买的。再就是向荣(人名)家卖了一些。

问:向荣家为什么卖地?

答:新政权来了压的他不行,公粮负担重。

问:公粮负担都是一样的吧,为什么他觉得重?

答:他家里劳力不多,自己又不想多劳动。新政权来了当时摊派多,就卖了。而且他主要是站栏柜(当售货员),不靠种地。<sup>③</sup>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像宣传的那样严重,即使有部分农民卖地,大多也是正常的生产调整,与自身贫富没有关

系。真正由于穷困而出卖土地的,仅是个别“懒鬼二流子”。

## 二、合作化运动顺利推进的原因

许多学者在对比中国和原苏联两国合作化道路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原苏联农民自古就生活在村社集体中,土地为集体公有;而中国长期实行土地私有,且无“传统公社”这种组织资源可以利用,理论上讲原苏联的合作化道路应该比中国更顺利。但实际情况却是原苏联的合作化遭到了农民的强烈抵制,半数牲畜被杀掉,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sup>[2]422</sup>,最后不得不出动正规军进行镇压。相比而言,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阻力就小得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几个发展阶段,期间既没有出现大批宰杀牲畜的现象,也无上述规模的抵制运动。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私有者”农民会比原苏联的村社农民更易于接受合作化呢?对此,国内学者做出了多种解释。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从传统文化角度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封建时代中国农民私有意识意识的长期缺失。而本文结合口述访谈资料和地方文献认为,无孔不入的农村基层党团组织和数量众多的党团员,是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顺利推行的主要原因。

清末以来,国家行政权力的下移便成为一种趋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党团组织更是深入全国大大小小的村庄,使得国家权力成功地实现了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以保德县为例,1950年全县共有党支部67个,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到1956年时已达到324个,基本上做到了村村有支部。党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50年全县有党员1982人,到1957年增加为2357人,其中农村党员就占到了2010人,占到党员总人数的85%。<sup>[3]210</sup>除党组织和党员以外,团组织和团员人数也在迅猛增加,具体情况见表1。而党员和团员也确实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请看笔者记录的口述资料:

1.问:当时让你入合作社时你愿意吗?

<sup>①</sup> 被采访人:王根留,男,1938年8月出生,保德县白玉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5日。

<sup>②</sup> 被采访人:王快璋,男,1938年3月出生,保德县白玉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3日。

<sup>③</sup> 被采访人:王喜全,男,1935年7月出生,保德县白玉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3日。

答:愿意。人家大家都愿意。因为领导一直比较信任我,我以前也当过兵,回来入了党,我个人也是先进分子。毛主席号召的不能说不愿意,(党员)干什么都要走到前头,不能落伍了。<sup>①</sup>

表1 保德县青年团组织情况统计表<sup>[3]229</sup>

年份	基层团支部	团员	发展团员
1949	33	1362	
1950	60	1361	
1951	61	1694	52
1952	62	1987	212
1953	51	2359	290
1954	50	2064	117
1955	79	2110	289
1956	242	2304	670
1957	280	2460	126

2. 问:第一年最先入社的有十二户,他们是什么身份?

答:属于进步的,愿意的。当时我们家也是十二户中的。

问:你家当时为什么入?

答:我爹当时是党员。党员、团员听从组织的号召,表现得积极。党员都入。

问:为什么党员、团员那么积极?

答:咱也弄不清楚,反正是凡是组织的人都积极,教育工作做的好。<sup>②</sup>

3. 问:咱们谈的具体点,你是什么时候入(农业社)的,怎么想的?

答:我们父子两人,还是我先入的。我爹是第二年才入的。

问:你们父子原先是一起生活吗,还是已经分家了?

答:没分开,因为入农业社才分的家。

问:你当时是不是党员或团员?

答:我是团员,团组织要求我们都入。

问:当时团组织要求你们动员家长入合作社了吗?

答:有了,我也可动员了。他们死活不入,我说你们不入,我自己入。我先入了,第二年他们也入了。<sup>③</sup>

部分现役军人的家属由于其觉悟相对于普通群众要高(或者说在群众眼中他们应该觉悟高),也对加入合作社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问:你家最早入农业社就是相信共产党?

答:对。相信国家。第一次入了十几家。香生家也入了。

问:你说的这个香生家当时日子过的怎么样?是不是很穷?

答:他家日子过的很好,不过思想积极。

问:他为什么思想先进?是党员?

答:不是党员,但有个当兵的儿子。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入的。<sup>④</sup>

在中共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坚持了依靠贫农的政策。包括高层领导人也认为贫农能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个群体应该是最积极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访谈中,部分富农对加入合作社非常积极,而有些贫农出于各方面考虑,迟迟不愿入社。

1. 问:村里特别贫困的人是不是入社很积极?

答:也不是。有的穷的都不愿意入。也有的领会不了精神,还有的觉得入了社不自由了,有觉悟的听宣传的就先入了,觉悟不高的就不入。

问:最初入时与经济地位无关,主要是看觉悟程度?

答:与贫富没关系。<sup>⑤</sup>

2. 问:那时候入社比较积极的人主要是些什么人?

答:主要是党员,在抗战时入党的,第二就是部分富裕中农。

问:富裕中农为什么积极?

答:地主、富裕中农也愿意入,他们怕斗他们。真正动摇的是中中农,因为他不是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他是团结的对象,他自己比较富裕,有一头牛或一二十只羊,有点余粮,能吃饱。<sup>⑥</sup>

3. 问:请你分析一下这四五户人家为什么

① 被采访人:赵密环,男,1932年8月出生,保德县路家沟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1日。

② 被采访人:赵苍小,男,1920年7月出生,保德县路家沟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1日。

③ 被采访人:王保孩,男,1932年9月出生,保德县白玉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4日。

④ 被采访人:王喜全,男,1935年7月出生,保德县白玉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3日。

⑤ 被采访人:赵苍小,男,1920年7月出生,保德县路家沟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1日。

⑥ 被采访人:陈一,男,1942年10月出生,保德县五楼沟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9日。

最先入社,是不是他们最穷?

答:他们家都不穷。来入社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形势所迫。这些人并不穷,入社是跟着社会走。(最先入社的)岳保柱是当干部的,他入了社再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也好做了。

问:五十年代村领导年龄一般多大?

答:一般都是三四十,都是土改时表现积极的人上来的。<sup>①</sup>

土改之后的农村,逐渐形成了以穷为荣以富为耻的观念。贫农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最安全的,地主作为被斗争的对象地位最低,而富裕中农地位最为微妙,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因而内心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富裕中农被排除在依靠对象之外,更使这个群体感受到莫大的政治压力。为了寻求心理安全,富裕中农对加入农业合作社表现非常积极。在我们的口述采访对象中,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有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是该村最先入社的一批人。当我们问他积极加入合作社的原因时,他说了一番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之类的套话。而私底下经过采访他的邻居,我们才知道这位被采访者的父亲在土改时曾经被批斗,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当中共号召成立农业合作社时,他家积极响应。这一案例体现了土地改革对促进合作化进程的影响。可以说类似现象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的田野访谈过程中得出一个规律,就是土改时阶级斗争激烈的地区,农业合作化进程也相对顺利。

### 三、合作化运动的成效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求富”、“求强”使古老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便是我国仁人志士的一大追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步履蹒跚,结果不尽如人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同时新老解放区的土改也顺利完成,为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接下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要想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难度是非常大的。在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把目光转向了国外,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经过二战以后迅速崛起的苏联,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学习对象。十月革命以前的苏联,资本主义工业相当落后,其国情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苏联实行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综合国

力迅速增强。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苏联已经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性大国。因此,苏联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两国在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上的相近,更使得学习苏联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可行的选择。具体到农业来说,既然传统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那么,走苏联集体农庄的道路就成为非常合理的选择。可以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变个体小农经济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模板带领中国农民迈向现代化的一次积极探索。

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和农业机械化没有大的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么,单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劳动组织形式是否能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呢?请看农民的回答:

1. 问:农业合作社到底在产量上比单干有没有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吗?

答:要说根本改变也没有改变,就是人民公社化也没有多大变化。不是合作化之后一下就有多大变化,保德县还是糜子窝窝头就拌汤。入农业社就有多大变化?那生活水平也确实没多少提高。毛主席解决的是贫富不公的问题。<sup>②</sup>

2. 问:合作化对产量的增加有作用吗?

答:也不大。也增加不了多少。

问:产量没有增长?

答:也没有。合作化后也没有增长。可能在有些地方能节省点劳力,但在我们村,没有作用。

问:在我们县合作化对农产品的产量提高有没有意义?

答:可以这么说。

问:高级社时产量是不是还不如以前?

答:差不多,只是看年景如何,好年头多产点。

问:搞了合作社对农民也没什么效果?

答:咱们这儿确实效果不明显。别的地方不清楚。<sup>③</sup>

3. 问:农业社的产量比单干强吗?

<sup>①</sup> 被采访人:王棉人,男,1940年9月出生,保德县白玉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3日。

<sup>②</sup> 被采访人:陈秉荣,男,1941年4月出生,保德县石塘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8日。

<sup>③</sup> 被采访人:赵苍小,男,1920年7月出生,保德县路家沟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1日。

答:差不多,农业社有了化肥产量才高了。

问:刚开始建社没有化肥吧?

答:刚建(农业)社那时候也打不下(粮食),刚够吃,有些没有粪土的人家吃也不够,就走口外。刚立农业社和单干差不多。

问:从三几年到五几年生活水平也没有变化?还是降低了?

答:没什么变化,和以前一样。<sup>①</sup>

4.问:人们就觉得(入农业社)产量会比单干强,初级社时期的产量是不是比单干强?

答:也不一定,肯定比那些懒惰的人收成就好,但和人家勤劳的人收成比不上。

问:农作物产量有明显提高是不是在有了化肥以后?

答:对,有没有化肥差别很大。那时候就是自然肥和牲畜人肥,个别经济条件好的就是黑豆、麻生,我小时候把黑豆早早就伴在粪堆里埋起来,到了春天再拉到地里,再一个就是从油坊买回来麻生伴在粪里,这样庄稼就长得非常好。<sup>②</sup>

在口述访谈中,大部分农民认为成立农业社对于农作物增产并没有什么效果,晋西北地区的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这一点从县志中也得到了佐证。据《保德县志》记载:1949年全县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32.6斤,到1957年增加为34.2斤,亩均增产仅有1.6斤。其中玉米由亩均38斤增加为42.2斤;谷子由40.1斤减少为33.9斤;高粱由49.3斤减少为40斤;黑豆由36斤减少为31斤。<sup>[3]83</sup>由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对农业增产作用确实不大,许多农作物1957年的产量甚至低于1949年。其实不单是保德县如此,从全国来说情况也大同小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比较了中国1929年—1957年的农作物单产量。其中稻谷亩产由1929年的446斤下降到1957年的359斤,小麦由141斤下降到114斤,大豆由112斤下降到81斤。主要农作物中只有玉米由177斤上升到191斤。<sup>[4]358</sup>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肥料对于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传统农耕方式下农民一般只施用农家肥。新中国成立后,化肥逐步得到推广,而且也确实对农业增产起到重要作用。从我们的口述采访

中农民也多次提到是在大量使用化肥之后农作物才真正得到增产。那么,农业合作化时期保德县化肥的施用情况如何呢?据县志记载,保德县从1953年开始使用化肥,当时全县施用量仅有2吨,绝大部分农田还是以农家肥为主。以后施用量逐步增加,到1958年高级合作社时期,化肥施用量为68吨。当年保德县共耕种土地458136亩,每亩平均施肥仅有0.3斤。而正常情况下,亩均施30—50斤化肥较为合适。<sup>[3]87</sup>可以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保德县,化肥的施用量相对于数以十万计的耕地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对农业的增产效果也极为有限。

#### 四、余论

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近千年来小农经济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农村土地经营管理体制的历史性变革,广大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他们本应是这场运动理所当然的主角。但以往的研究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为我们所展示的往往是各级领导人的决策过程,甚少看见农民的身影。而近年来兴起的口述史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它极大地扩大了史料范围,使得普通民众作为历史主角成为可能。其次,口述资料与档案文献相互印证,有效地纠正了文字史料的片面性。同时,口述资料的生动性是传统档案资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采用口述史的视野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真实再现了被这场运动裹挟之下的农民纷繁复杂的行为和心理,有效推进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学术研究。

① 被采访人:赵小诺,男,1932年5月出生,保德县赵家坡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20日。

② 被采访人:王快璋,男,1938年3月出生,保德县白玉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2月13日。

#### 参考文献:

- [1] 田茜如. 山西农业合作化[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2] 沈志华.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3] 陈秉荣. 保德县志[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 [4] (美) 珀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